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

孙荪 王鸿生 主编

阅读  
的  
理性

曲春景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芒果新批评文丛

# 阅读的理性

曲春景

经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的理性/曲春景 著 .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5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孙荪 王鸿生 主编)

ISBN 7-80127-340-0

I . 阅... II . 曲... III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212 号

### 阅读的理性

著者	曲春景
责任编辑	刘加民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总字数	853 千字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总印张	41.5 印张

ISBN 7-80127-340-0/G·155 全套 (6 册) 总定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金芒果新批评文丛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鸿生 孙 苏 刘思谦  
张保振 陈维会 何向阳  
武泉水 耿占春 鲁枢元

策划人

阎 婕 孙铁道 王运一

## 总序

90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和学院这两种体制化力量的互动关系，而不像80年代那样，其活力常来自自发的思想热情和文学兴趣。

对那些不在意文化生产特征而只注重知识转型的人们来说，今日之批评无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诸多数年前还令人惊诧莫名的新术语、新观念，如今早已泛化为职业人士乃至普通文科大学生手中的常识了。但并不使人感到乐观的地方在于，知识的进步并未使当代批评免于“过剩”与“匮乏”的双重困扰。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炒作”或无谓“争论”所造成的话语消费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对文学和文学生活的实际介入能力越来越显得萎缩。如果不是出于学位、职称、成果登记或学术权力等方面的强迫性考虑，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批评就将沦为一块无人愿意认领的荒地。

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一些作家、读者和文化官员并不喜欢认真的批评，他们往往只需要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场合，批评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即使在文坛、学界，批评也未必被看作什么大本事、真学问，公开的或私下的奚落常常令批评家本人也自惭形秽。从经济学角度看，批评就更是一个投入、产

出与收益毫不成比例的行当，既然人都要生存，既然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任人选择，那么，谁乐意老是找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来干呢？就此而言，批评队伍的溃散和青黄不接，实在不是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

常听到有人感叹中国缺少“大批评家”。此言固然不谬，但造就“大批评家”的土壤、环境和气候却不应落在视线之外。一位旅居海外的画家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日，他在烈日下写生，一位途经这里的新西兰太太停足看他画画，不大一会儿，又用手中的报纸叠了个帽子，轻轻戴在他头上，然后悄然离去；走了没几步，回头一看，风把帽子吹掉了，老太太又折回身拣起帽子，重新给他戴上，并用力按紧，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画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他眼里都有湿润的东西在闪光，我们都知道，一种热爱艺术的民族传统和社会氛围，对艺术和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世纪里，“大批评家”的诞生，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难道不应该从这样一顶“纸帽子”开始吗？

其实，以中原之大、中国之大，并不乏不计名利、特立独行的批评新人，缺少的只是对他们的发现、理解与推重。孙荪先生和我之所以立意选编这套丛书，首先是为了表达一种歉意，因为，作为兄长、同道者或身边的朋友，在他们寂寞燃烧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应该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情太多。其次，我们当然希望，这套丛书暨首编的六本批评文集，对人类人文精神之薪火的承传和宏大，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特别需要感谢河南省金芒果集团，在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世风中，他们慨然向处境艰难的文学批评伸出了援

手。在我的感受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赞助，而是一种温暖的鞭策，其中包含着对精神探索价值的实实在在的肯定。同时，这套文丛的问世也有赖于经济日报出版社的具体努力，我们深知，并不是所有出版社都具备这种眼光和气度的。

愿文丛有益于读者心智，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一切或如荷尔德林所咏：“在此缺失的，自有一位上帝在彼处弥补”。

王鸿生

2000年6月16日

# 目 录

总 序.....	王鸿生 (1)
一 文化与艺术思考 (1)	
§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	(3)
§ 神话思维与艺术.....	(20)
§ 必要的思想前提.....	(40)
§ 创作方法与作家个性.....	(45)
§ 1988年小说文体研究概观 .....	(61)
§ 理性经验的欠缺.....	(68)
§ 文坛景观的缺席者.....	(71)
§ “顾准热”的另一面 .....	(80)
二 寻求理性的对话 (83)	

§ 现代人文精神的生成.....	(85)
§ 对“文革”的再叙事 .....	(102)
§ 文学与语言的对话 .....	(116)
<b>三 阅读的理性 .....</b>	<b>(129)</b>
§ 不堪的生命 .....	(131)
§ 与现实对应 .....	(134)
§ “失重”的语言学表现.....	(138)
§ 命运之门被怎样敲响 .....	(145)
§ 精神深处的真实 .....	(155)
§ 祈祷、反讽与默想 .....	(159)
§ 反神话与“文化大革命”再思考 .....	(192)
§ 放牧人群：从苏格拉底到呼天成 .....	(208)
§ 权力文化的叙述结构 .....	(220)
<b>代跋 理解与批评 .....</b>	<b>(228)</b>

---

# **文化与艺术的思考**



#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 一、后现代理论的盲见

自后现代理论和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域之后，现代性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启蒙问题，始终是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心。目前，市场经济社会带着现代性的诸种弊端和民族旧有的历史特征，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生存困境。面对这一困境，我们不得不重新关注“五四”以降一再重提的问题——以何种价值立场言说“现代性”。

在今天的语境中，错综交织的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使我们丧失了世纪初启蒙者面对现实抉择自己立场时的毫不犹豫，也丧失了80年代新启蒙呼唤改革时的义无反顾。当下，我们处身于新老两代启蒙者吁请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各种困境，人们不得不反思和调整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现代化理想。但是，在哪个维度上反思和调整呢？一方面，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认识层面上的差异，目前思想界和学术界能够拿出来的诸种文本、策略，虽各有其精湛和新鲜之处，但也充斥着一些理论上的偏执和形而上学的误导，使人既爱其深刻又不忍其谬见。因此，当我们面对现实困境，思考和寻找自己的价值态度和言

说立场的时候，那种跨一步挟着危机，退一步陷入专制，以及由此所致的瞻前顾后进退维谷，比世纪初知识分子面对封建社会打出革命的大旗要艰难得多，也比 80 年代文化人面对十年浩劫所做的历史批判要困苦得多。

现代社会是我们参与其中而争取来的社会。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随着价值尺度的改变，随着各种现代化手段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转换，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以我们不敢正视的面目汹涌而来：两极分化日渐严重，腐败现象强令不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某些政治特权与经济精英联手作业，不公正再一次成为一些人的生存命运，等等。这些与市场社会俱来的苦果，不仅使 80 年代坚持启蒙并直接参与推进改革的思想者陷入困顿，而且，也为世纪初那些奋力把“科学”“理性”作为普世之光引进中国的前辈们始料不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初衷是一样的。他们都仅仅考虑到科学和理性能够给人们带来的正面效益，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对科学和理性的过分推崇，同样造成思想领域里的压迫和集权主义的横行，更没有想到科学技术对物质生产力的要求，使科学成了一面鼓动人类掠夺和贪婪的旗帜，使技术成为满足各种利益和欲望的工具。科学和理性不仅导致了功利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意义世界的丧失和精神世界的堕落。启蒙思想家许诺给我们的光明美好的现代社会，带着病态、带着危机、带着丑陋，率先进入西方社会。百余年之后，随着我国向现代化的挺进，一些困境也尾随而来。因此，对以科学和理性为核心的启蒙主义的讨伐，成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特征。并且，围绕着对“现代性”问

题的讨论，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而这些产生于西方的檄文和理论，目前，又是我国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和思考的主要思想资源。所以，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也因对“科学”“理性”的张扬和对现代社会的呼唤，受到了国内一批学者的前后左右的夹击。这种夹击，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本土问题相当有力的回应（国内也有人把这种回应称之为“新左派”）。

问题在于，这一回应在学术思想上呈现出的态势，使人在希望中充满着忧虑。一方面，它报晓了思想界日益独立的思考，对启蒙主义的反思，既提醒着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砥砺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回应，在对待本土问题上，特别在对待新老两代启蒙主义者的态度上，丧失和回避了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和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然而，我认为这种“丧失和回避”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强势话语对经验的裁剪和改变。被引进的理论，特别是切中现代性时弊而又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在知识形态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经接受，会对思想和观念产生较强的征服力，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视域和解读模式。这些来自欧洲的理论视域和解读模式，照亮和深化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关问题上的思考，但同时也容易导致视域之外的盲见。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学者，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容易忽略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视域之外的存在。但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经验和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中国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去清理和探讨的。因此，国内这批从后现代立场出发对启蒙主义所做的批判性回应，有其深刻和洞见之处，但

在对待本土问题上，却非常遗憾地形成了理论的盲见。

这种盲见的表现是：以西方某种既定的理论为框架，论证和运思不在问题的实际经验层面上运行，而仅在自身能够推衍和支撑的范围内滑动，臣服于来自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它所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悬浮在问题之上，与所论问题的实际情况形成某种错位和偏离。

目前在解读和反思新旧启蒙主义存在历史的时候，由这种理论的盲见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和对待现实的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与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的偏离。这种态度的基本倾向是：否定 80 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认为“文革”结束之后，知识分子应该转向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应该把前段社会主义实践理解成封建主义传统。例如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对新启蒙的反思和清理。他认为：新启蒙主义者对改革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仅仅限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没有把这段社会主义实践，当作“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进行批评和反省，从而回避了这段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把传统社会主义理解成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这不仅是中国‘新启蒙’的斗争策略，而且也使它获得了一种自我的认同，即把自己理解成与针对宗教专制和封建贵族的欧洲资产阶级相似的社会运动”<sup>①</sup>。汪晖对新启蒙的这种批评，与世界范围内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是接轨和一致的。文章雄辨犀利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但在这个问题的论述上，却丧失掉十年浩劫刻在数亿中国人经验之上的切肤之痛。由科学理性所导致的现代危机是应该批判和反省的，但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主宰中国命运、使这个民族历遭劫难的主要

社会内涵和意识形态根源，是由于对科学理性的过份推崇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所导致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段历史过去得还不太久，很多人都是它的亲证者。记得小时候在“文革”中认识一个词叫“评法批儒”，一直不明白其真实含义。后来读书时看到荀况的“才学反时，杀无赦”，并且又认识了主张强权专制的韩非，才明白当时的执政者为什么要继续推崇法家。因此，“文革”结束后，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声讨和批判，对那段历史时期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有能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不必一定要借助舶来的大家。今天，知识界应该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解读这段历史。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也一定要和世界接轨，以引进的后现代理论框架为规范，切除或过滤掉我们自身的经验，指责新启蒙没有把这段历史当作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进行批评，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立场，令人担忧。

在中国思想史上，如果对启蒙运动进行反省的话，不能忽略产生问题的具体语境和我们自身的历史。况且，从目前社会所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上看，虽然部分是由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危机，但同时这些危机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有些直接就是封建主义的套路。这些难以驱除的封建色彩，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明显的不同于西方后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现代危机。因此，我们面对市场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是否一定要追逐西方后现代思潮，对启蒙主义进行相应的审判？这是一件特别需要审慎的事情。即使现代性危机已经对人类生存出示了黄牌，我们必须重新作出选择，也没有必要因此去青睐封建专制主义

的东西。对于本世纪才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中国现实来说，启蒙，既不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相对立，也不能说已经过时或完成。

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和形成，意味着“科学”“理性”超越了自身的合理限度而产生了负效应，其前提是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封建主义已经没落和衰亡。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从16世纪开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进行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们有四百年的反对封建传统的历史，科学和理性的大旗高扬了几个世纪。而我国的情况大不相同。本世纪初，中国才出现了从封建帝制向民族国家的缓慢转变，并且仅仅表现在外部形式上。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还处在浓郁的封建意识之中（个别精英除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还完全浸泡在封建社会的囚禁之内。“五四”时期狂飙突进式的反封建运动，并没有对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有多大的改变。即使最终获得成功的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没有包含着沉重的封建主义因素。中国有大量有志之士在封建主义的顽固势力中拼搏甚至丧生。但汪晖的文章概括这段历史的时候，回避掉滞留在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中这一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认为从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些有识之士都思考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sup>②</sup>。这种解读是新颖的，但是，在晚清以降的现代社会中能生长出以反对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思想，也只能是理论家在盲见中对这段历史的富有创造性的解读。这种理解对于实际存在的中国历